

· 学术史 ·

查尔斯·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述论

曲 升

内容提要 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是查尔斯·比尔德史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得出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与美国国家利益相悖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主张放弃国际主义和干涉主义,专事“国内门户开放”。源于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比尔德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大加挞伐。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开创了美国外交史学的进步主义传统。知识论层面的宏观性和意识形态层面的激进性,是比尔德进步主义外交史学的两大特征,并赋予其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查尔斯·比尔德 美国外交史学 国家利益 大陆主义 进步主义

对中国学术界而言,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 比尔德(Charles A. Beard, 1874—1948)并不陌生。他在美国政治史、文明史领域的代表作大多有中文译本。^① 他的经济史观、美国立宪史研究等史学成就,也一度成为中国史学家热衷的研究课题。^② 但是,截至目前,中国史学界对比尔德史学的介绍和认识尚不全面。除了美国政治史、文明史之外,美国外交史也是比尔德所从事过的重要研究领域。对此,我们却知之甚少。比尔德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学术重心是构建经济史观并运用它分析美国政治史和文明史;^③ 后期的学术重心转为美国外交史。20世纪30年代,他的外交史研究主要分析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并在此基础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3YJA770027)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美国外交史学史”(项目编号:13BSS026)的阶段性成果。

-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学术著作的中译本主要包括:何希齐译:《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朱曾汶译:《美国政府与政治》,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许亚芬、于千译:《美国文明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杨日旭译:《共和对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 ② 主要包括丁则民《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宪法——美国史学对比尔德关于美国宪法的解释的评论》,《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2期;王晴佳《查尔斯·比尔德经济史观的形成及其影响》,《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1期;陆镜生《查尔斯·比尔德和他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6期;罗荣渠《查尔斯·比尔德及其史学》,罗荣渠《美国历史通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 ③ 查尔斯·A. 比尔德1930年之前的美国政治史和文明史著作主要有:《美国政府与政治》(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麦克米兰公司1910年版;《高等法院与宪法》(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Constitution),麦克米兰公司1912年版;《美国宪法的经济观》(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麦克米兰公司1913年版;《杰斐逊民主的经济根源》(Economic Origins of Jeffersonian Democracy),麦克米兰公司1915年版;《政治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Politics),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公司1922年版;《美国文明的兴起》(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麦克米兰公司1927年版;《美国政党之争》(The American Party Battle),麦克米兰公司1928年版。

上提出自己的国家利益观和“大陆主义”(Continentalism)的外交政策主张。^① 20世纪40年代,他在进一步升华对美国宪政体制和美国文明本质思考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现实,严厉批判罗斯福总统的外交政策。^②

美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及其外交思想,但关注的重点一直是比尔德外交政策观的思想类型、主要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对其方法论特征和史学史意义的发掘和阐释不足。^③ 在我国,尽管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比尔德在美国外交史学进步主义范式中的开创性地位,但还没有深入研究的专门论著。^④ 本文试图在梳理比尔德美国外交史学的基础上,从史学史的角度对比与联系其他学派和学者,继而分析总结比尔德外交史学的特征及影响。

一、对美国历史上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的考察

20世纪30年代之前,比尔德在教学和研究活动中,就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美国外交史的零散论述,孕育了之后其外交史学的一些基本命题。

1904年,比尔德在其开设的《美国扩张史》本科课程教学大纲中提出了两个基本命题:第一,墨西哥战争前,商业的快速发展为美国海外扩张打下了经济基础;第二,帝国扩张会给国家带来诸多不良后果,其中极为重要的是为某些阶层提供了把国家的注意力从“国民生活问题”转移开来的机会。这

-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外交史著作有:《国家利益观念:美国外交政策研究》(*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An Analytical Study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麦克米兰公司1934年版;与乔治·史密斯(George H. E. Smith)合著:《国内的门户开放:一种试验性国家利益哲学》(*The Open Door at Home: A Trial Philosophy of National Interest*),麦克米兰公司1934年版;与乔治·史密斯合著:《战争恶魔论:历史本质与置身战争之外的可能性研究》(*The Devil Theory of War: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Histor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eeping Out of War*),先锋出版社1936年版;《头脑发昏与对外争吵:美国对外政策评估》(*Giddy Minds and Foreign Quarrels: An Estimat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麦克米兰公司1939年版;《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A Foreign Policy for America*),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公司1940年版。
- ② 查尔斯·A. 比尔德在20世纪4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两部:《1932—1940年:制定中的美国外交政策》(*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1932—1940: A Study in Responsibilities*),耶鲁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1941年: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1941: A Study in Appearances and Realities*),耶鲁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
- ③ 专门研究查尔斯·A. 比尔德外交史学和外交思想的论著主要包括:杰拉尔德·斯图尔茨:《查尔斯·比尔德论美国外交政策》(Gerald Stourzh, "Charles A. Beard's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世界事务季刊》(*World Affairs Quarterly*)1957年第2期;托马斯·C. 肯尼迪:《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外交政策》(Thomas C. Kennedy, *Charles A. Beard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佛罗里达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克莱德·W. 巴罗:《转移命题与辩证的帝国主义:查尔斯·A. 比尔德的美国外交政策理论再回顾》(Clyde W. Barrow, "The Diversionary Thesis and the Dialectic Imperialism: Charles A. Beard's Theory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visited"),《美国政治发展研究》(*Study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997年第2期;坎贝尔·克莱格:《查尔斯·比尔德并不令人诧异的职业》(Campbell Craig, "The Not-So-Strange Career of Charles Beard"),《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2001年第2期。此外,下列论著对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和外交思想也有所涉及:霍华德·比尔主编:《评查尔斯·比尔德》(Howard K. Beale ed., *Charles A. Beard: An Appraisal*),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54年版;伯纳德·C. 波尔宁:《查尔斯·比尔德的政治和社会思想》(Bernard C. Born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ought of Charles A. Beard*),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孔华润:《美国修正主义者: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Warren I. Cohen, *The American Revisionists: The Lessons of Intervention in World War I*),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帕林顿》(Richard Hofstadter, *The Progressive Historians: Turner, Beard, Parrington*),兰登书屋1970年版;艾伦·诺尔:《查尔斯·比尔德:一个知识分子的传记》(Ellen Nore, *Charles A. Beard: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南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H. W. 布兰迪斯:《美国欠世界什么:关于外交政策灵魂的斗争》(H. W. Brands, *What America Owes the World: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Foreign Policy*),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 ④ 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第29页。

被克莱德·巴罗(Clyde W. Barrow)归纳为比尔德外交史学中的“转移命题”(the diversionary thesis)。^①这两个带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命题是比尔德建构自己美国外交史学体系的基础。在《今日欧洲逆流》一书中,比尔德提出了“小美国主义”的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主张,建议放弃“门户开放”政策,不再动用外交或军事手段保护美国公民的对外贸易或投资活动;停止领土兼并和追求势力范围;给予菲律宾独立,使夏威夷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利益和安全的最前哨。^②1930年,比尔德与儿子威廉合作出版了《美国利维坦》一书,尝试从经济角度阐释美国外交史。该书认为,“正是华盛顿督促其国民在世界市场上大力发展商业利益,才持续不断地把国家拖入到世界政治的浪潮中”,继而打开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扩张的大门,美西战争“不过是由不断拓展美国商业利益的重大事件构成的长链条上的一环”。^③

总之,比尔德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著作中,已经初步提出了反对国际主义外交路线的政策主张和从经济角度解释美国外交史的基本方法。这一时期美国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为比尔德从“国家利益”的理论高度提出系统的美国外交史学说和外交政策路线创造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当时,美国正处在大危机的最严重时刻,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势在必行。比尔德一向坚持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的进步主义信念,提出了以国家计划为特征的较为全面的经济社会改革方案。他意识到,对海外贸易和投资的大规模追求无助于解决国内问题,所以只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才能保证国内改革计划的成功实施。^④从国际上看,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军备竞赛愈演愈烈。1927年日内瓦海军会议的失败和1930年《伦敦海军协定》的签订,都表明事态在恶化。与此相应,美国胡佛政府内部产生了海军拨款的争论,比尔德所称的“大海军男孩们”(The Big Navy Boys)扩大海军建设的主张日益占据上风。比尔德对此忧心忡忡。为了影响舆论,他在1931年10月至1932年2月的5个月时间内连续发表了5篇文章,批驳海军军官、海军部官僚和同情扩建海军的政客的观点、动机和行为。^⑤在这些文章中,比尔德开始探讨“国家利益”这一学术问题。其中,《建设一支更大更好的海军》一文提出,参加1932年2月日内瓦裁军会议的美国代表必须事前考虑的几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利益?谁拥有界定它的权利?什么是充足的国防?对什么目的、什么人而言是充足的?为什么陆海军变得日益壮大和精良?通过战争能有何所得?何人、何时获益以及是否真的获益?海军至上主义和帝国主义能否带来好处?何人从中获利?”比尔德对相关部门官员未能提出这些问题以及现有学术成果无助于回答这些问题颇感失望。^⑥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美国扩张史教学大纲》(Charles A. Beard, "Syllabus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第2、13页。转引自托马斯·肯尼迪:《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7页;也见巴罗《转移命题与辩证的帝国主义》,第252—253页。

② 查尔斯·A. 比尔德:《今日欧洲逆流》(Charles A. Beard, *Cross Currents in Europe Today*),马歇尔·琼斯公司1922年版,第259—270页。

③ 查尔斯·A. 比尔德、威廉·比尔德:《美国利维坦:机器时代的共和国》(Charles A. Beard and William Beard, *The American Leviathan: The Republic in the Machine Age*),麦克米兰公司1930年版,第733—734页。

④ 查尔斯·A. 比尔德主编:《美国面对未来》(Charles A. Beard ed., *America Faces the Future*),霍顿·米福林公司1932年版,第136页。

⑤ 托马斯·C. 肯尼迪:《查尔斯·A. 比尔德与“大海军男孩”》(Thomas C. Kennedy, "Charles A. Beard and the 'Big Navy Boys'"),《军事》(*Military Affairs*)1967年第2期,第65—73页。

⑥ 查尔斯·A. 比尔德:《建设一支更大更强的海军》(Charles A. Beard, "Making a Bigger and Better Navy"),《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1931年10月14日,第223页。

1934年,比尔德与乔治·史密斯合作完成了《国家利益观念》一书。该书对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观念及其实践进行考察分析,阐述了国际主义外交路线、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均与美国人民的普遍福利背道而驰的观点。同年,二人还合作出版了《国内的门户开放:一种试验性的国家利益哲学》。该书主要阐发比尔德本人的国家利益观,并据此提出了“大陆主义”的外交政策路线和“国内门户开放”的改革方案。这两部书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比尔德的美国外交政策(史)观,因此被视为“比尔德外交史学的代表作”。^①

比尔德指出,美国历史上政治领导人和思想领袖的国家利益观往往含义模糊、歧义叠生,一旦与具体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相联系,基本等同于他们所代表的政党和特殊集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纵观美国外交史,主要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观念,即“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和“汉密尔顿主义”(Hamiltonian)。

杰斐逊主义的政党构成和农业经济利益密切相关。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在北美大陆攫取土地,拓展自给自足、相对独立的农业文明。^②这种国家利益观指导下的外交政策实践便是购买路易斯安那(1803年)、1812年战争、购买佛罗里达(1819年)、兼并德克萨斯(1845年)、美墨战争(1846—1948年)、兼并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解决西北边界争端(1846年)以及加兹登购地(1867年)。1893年,随着“边疆”的消失,杰斐逊式外交政策关切由先前的攫取土地转向出口过剩农产品。大危机爆发后,出口过剩农产品的要求更加强烈。罗斯福政府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便是杰斐逊主义国家利益观的代表。对于20世纪30年代杰斐逊式外交政策实践的逻辑,比尔德归纳如下:(1)目前,美国国内不能消费和利用大量过剩的工业品、农产品和资本;(2)如果降低关税,其他自由贸易的阻碍或以直接方式、或以互惠安排的方式得以扫除,生产过剩问题就可以在国外得到妥善解决;(3)其他国家正在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前进,或可以被引导去降低关税,政府应该完善准入、配额、出口奖励等不利于货物自由流通的政策;(4)最终,通过自由贸易解决过剩问题,消除危机,保护国家利益。^③

汉密尔顿主义的追随者及其经济活动属性是商业性的。海外转运贸易、海外工业品市场以及美国资本海外投资机会,是他们始终不渝的追求。19世纪末,经过内战后的全面工业化,美国确立了遥遥领先的工业大国地位,从而树立了汉密尔顿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建立商业帝国外交战略的主导地位。在比尔德看来,汉密尔顿式的工商业帝国主义不同于历史上的帝国主义,其特征为:第一,以控制海上航线,而非攻城略地为基础,具体体现为佩里叩关日本(1854年)、米德攫取萨摩亚、马汉的海权论和美西战争。第二,奉行门户开放政策,即不是追求兼并土地,而是追求自由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安全,以及可返还美国的盈利能力。20世纪20年代的“金元外交”本质上也是门户开放政策。^④有关20世纪30年代汉密尔顿主义外交政策逻辑,比尔德作出如下归纳:在技术创新机制下,美国工业正在生产美国人消费不了的商品,这种过剩的工业制成品只有通过出口方能解决。此外,美国的

① 托马斯·肯尼迪:《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外交政策》,第59页;杰拉尔德·斯图尔特:《查尔斯·比尔德论美国外交政策》,第120页。

② 查尔斯·A.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52—58页。

③ 查尔斯·A.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71—72页。

④ 查尔斯·A.比尔德:《当代美国史(1877—1913年)》(Charles A. Beard, *Contemporary American History 1877—1913*),麦克米兰公司1914年版,第224页;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99—101、550页。

民间资本储量巨大,已超过国内所需,这也是一种需要出口的“过剩”资本。同样,还有“过剩”的农产品亟待国外市场消化。否则,美国工农业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收益、获利机会将会放慢,并有可能走向无法破解的死路。^①

通过比尔德的上述分析可见,杰斐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的国家利益观及外交政策路线具有很大的共性——两者都是扩张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而且它们在19世纪末实现了“合流”,海外市场成为二者的共同诉求。比尔德指出,这种国际主义的外交路线是与美国人民的普遍福利背道而驰的。他引用大量统计数据证明,向遥远地区进行商业扩张政策的实际结果是,即便那些认为会从中大获其利的美国人也所得甚少,而对世界其他人口而言更是一种伤害。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以及其他一些以国家利益名义进行的外交冒险的成本,是远远超过它们给国内带来的经济收益。^②他指出:“避免经济危机的主要出路,不在于通过国际会议达成某些调整,也不在于经济力量的向外延伸,而在于以确立安全(security)为目的的国内经济利益协作。这种安全是可以通过整合性的经济活动和更加有效的财富、购买力的再分配来实现。”^③基于这种认识,比尔德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利益哲学,以及基于这种哲学的“大陆主义”外交政策路线和“国内门户开放”的经济社会改造方案。

二、“大陆主义”国家利益观及其外交路线主张

比尔德是这样界定国家利益的:国家利益涉及如何着眼长远,精心协调生活的稳定和协调两者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安全框架内,创建并保持一种为全民共享的高生活标准,以及有利于提高个人和社会美德的工业(生产、消费)模式。所谓“国家安全框架”主要涵盖美国的北美大陆本土、夏威夷和巴拿马运河区,最多可拓展至美洲大陆。^④二是“美国人民在其现有地理家园内的生命安全”^⑤,即所谓的“稳定”。比尔德所说的这两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简化为“国民福利”和“国家安全”。所谓“着眼长远协调两者之间关系”,是比尔德在反思美国外交史后得出的结论。比尔德认为,国际主义者把美国国内的经济繁荣与海外市场联系在一起,是美国卷入战争的根源。“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会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与美国国民在相关地区的经济利益的扩张程度、以及利益相关交战国的(胜负)命运直接相关。”^⑥但是,战争需要大量军备建设,需要付出生命代价,并且威胁国家安全。相比之下,虽然不干涉政策可能需要放弃一些海外市场,给美国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这些损失相对于军备竞赛和战争破坏显然要小得多。所以,从长期来看,不干涉政策才是真正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在于向外扩张,而在于内部改革,要把美国人的精力限定在美洲大陆这一“国家安全框架”之内,这就是“大陆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比尔德设想在四个领域内推行自己的国家利益哲学:国民性、国民经济、国防和国际关系。比尔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37—38页。

②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247—294页。

③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家利益观念》,第545页。

④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10页。

⑤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61页。

⑥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69页。

德重点谈了后三个领域内的政策设想,概括起来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在经济社会领域实现“国内门户开放”;限制国防的范围和规模;在对外关系领域,实现“管制贸易”政策,减少美国对海外市场 and 资源的依赖。

为实现国内的门户开放,比尔德建议:首先确定“国家生活标准预算”,在此基础上进行国民财富再分配,确定工农业生产规模。在上述条件下,对外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进口既定生活标准所需的商品”,而非扩大和推动出口。^① 为达此目的,需要成立“联邦贸易公司”或类似机构,实施贸易管制政策。“在追求安全和高生活标准的过程中”,实现“对国内自然资源和国家工业艺术的最有效利用,以精心培育美国自己的后花园,取代超过陆海军防务范围之外的、浪费严重、不切实际且徒劳无功的利益扩张”。^②

大陆主义国家安全政策基于保证“美国人民在其现有地理家园内生活安全”的原则,强调限制国防规模和文官控制军事部门。比尔德指出:“陆海军规模应该取决于这一政策的合义性(vindication),而不是其他任何标准。”^③他曾对这一“合义性”标准做过解释:在大陆主义框架内,“国防意味着保卫我们的大陆遗产,而不是为了保卫世界任何地方的美元与任何或所有大国为敌”。^④换言之,这种国防政策将限制和减少“在遥远地带无法兑现的承诺”,收回对美国私人投机银行家海外贷款的安全保证,停止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土兼并,邀请所有拉美国家加入争端解决合作机制,并创建一个西半球贸易区。^⑤

比尔德特别强调:大陆主义植根于美国的经济利益,却并非“不惜任何代价求和平的和平主义哲学”;相反,它“以这样的方式安排自己的承诺和责任: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以最大能力赢得胜利,从而捍卫承诺和责任;它绝不提出什么全球性的要求,却在实际中拒绝向其陆海军提供履行承诺所需的武力;它谨慎持重却非胆小怯懦,三思而后行却非消极无为;它爱好和平,却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⑥

比尔德以乐观的笔触展望了“大陆主义”国家利益观和外交路线的前景:“通过对自家后花园的培育,通过树立国家自我克制的榜样……不做任何非用武力不能兑现的承诺,对其他国家采取公平、开放的货物交换政策,绝不给它们在任何事务上提供道德性建议,而且提供一套足以捍卫上述政策的陆海军机器。如此,美国将会实现最大程度的安全,对美国控制之外的政府和局势的最小程度的依赖,以及最高效地开发其资源。”^⑦

不难看出,隐藏在比尔德思想深处的是一种“美国例外论”,他继承了美国历史上的“山巅之城”、“自由灯塔”等思想,并将其引申为“比尔德博士的后花园”。^⑧ 这就是,发展自己,树立人间“典范”,以“典范”的感召力而非横加干涉来改造世界。

①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18—219、213页。

②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7页。

③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61页。

④ 查尔斯·A·比尔德的话引自《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32年2月28日,第二版,第4页。

⑤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13页。

⑥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303页。

⑦ 查尔斯·A·比尔德:《国内的门户开放》,第273—274页。

⑧ “比尔德博士的后花园”是布兰迪斯的说法,他分析了比尔德外交政策思想中的“例外论”和“典范论”。参见H.W.布兰迪斯《美国欠世界什么》,第109—143页。

《国家利益观念》和《国内的门户开放》出版后,有评论认为,比尔德的“国内门户开放”不过是一种“经济民族主义”的方案,并有可能导向沙文主义。^①更普遍的看法是,比尔德“已经走向孤立主义”。^②针对这些异议,比尔德在1940年出版的《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一书中作出回应。他认为,大陆主义并非一种“盲目的孤立主义”(a blind isolationism),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反对与其他大国的合作,而是提供了一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作出选择,与其他政府达成临时安排的积极计划(即国内经济发展和财富再分配)”。^③比尔德并不否认欧洲或其他任何地区的战争会影响美国的事实,不过他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尽管军事力量强大,但若去“救济、恢复或维持其利益和控制范围之外的生命,却非其力所能及。应该承认的残酷现实是:美国,无论单枪匹马,抑或与他国联手,均不拥有把和平强加给欧洲和亚洲,并确保在那里建立民主和平政府、或提供此类政府长存所必需的社会和政治基本保证的能力”。因此,“大陆主义者并不否认美国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相反,他们乐于在这种前提条件下承担责任:始终对美国权力在自然、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有限性保持清醒认识;始终对捍卫共和的神圣义务保持清醒认识;防止朝着灾难方向发展的不幸事件发生”。^④比尔德在这里告诫美国应量力而行,较早地提出了“帝国过度”扩张的命题。

在《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一书中,比尔德修正了他此前对美国外交史的某些观点。比尔德此前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史是连贯一致的,杰斐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在19世纪末实现了合流,从而使美国走上了海外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在这本书中,比尔德认为,连贯一致的美国外交史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断裂或背离。在此之前的美国外交政策是符合“大陆主义”的,华盛顿对联盟的反对、门罗和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欧洲国家不得涉足西半球的警告,“保持了(外交政策的)连续性”。由于孤立于大国政治之外,并确立了对美洲的控制,美国也得以“免除大规模征兵、数量惊人的债务和重如大山的赋税之苦”。^⑤而1898年的美西战争及随后对菲律宾的占领,则是帝国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合作反对大陆主义的结果。^⑥此后,是1916—1919年间国际主义路线带来的灾难和凡尔赛的混乱。当下,则是美国卷入二战的可怕前景。总之,19世纪90年代之后的美国外交史,就是国际主义经济精英及其政府内部盟友在他们自己的世界角落里保持安全的历史。所以说,19世纪末的帝国扩张是对“大陆主义”外交政策的背离。

至此,比尔德完成了“大陆主义”外交史解释模式的建构,使之成为一个集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于一体的宏观性解释体系。

三、对美国卷入战争的思考和对罗斯福外交政策的批判

比尔德既是一个研究型学者,又是一个活跃的行动主义者。1934年后,他加入当时有关“中立法”的全国性辩论中,力陈现存“中立法”的种种不足,主张实行严格的中立法。针对1937年10月5

① 赫伯特·菲斯:《国内的门户开放》(Herbert Feis, "The Open Door at Home"),《外交》(Foreign Affairs)1935年第4期,第611页。

② 亨利·A. 华莱士:《比尔德:计划者》(Henry A. Wallace, "Beard: The Planner"),《新共和》1935年1月2日,第225页。

③ 查尔斯·A. 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第18页。

④ 查尔斯·A. 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第152页。

⑤ 查尔斯·A. 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第12页。

⑥ 查尔斯·A. 比尔德:《一项为美国制定的外交政策》,第146页。

日罗斯福总统的“防疫演说”,比尔德撰文反对集体安全原则。他还于1938年2月9日参加了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批评罗斯福政府额外军事开支的要求。珍珠港事件前,他参与到外交“大辩论”中,反对美国卷入战争。这些活动使他“成为孤立主义在知识界的主要发言人”。^①在其活跃政治身影的背后,是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对美国卷入战争的深切忧虑。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观察到的,1934年之后比尔德撰写历史的实用主义色彩越来越浓厚,如何使美国置身战争事外成为他思考的首要目标。^②

1935年2月,比尔德发表了题为《国家政治与战争》的文章,力求揭示美国政治周期与战争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在美国政治史上,“富人和天才”的政党——共和党及其前身辉格党和联邦党,只有在杰斐逊时代和杰克逊时代才被排除在国家最高权力之外。尽管这两位总统都做出了把美国经济制度引向更加集体化目标的姿态,但无论杰斐逊的共和党,还是杰克逊的民主党,都被战争所害。1812年战争和1861年至1865年内战转移了公众对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并把权力拱手让与“富人和天才”的政党。揆诸历史,比尔德认为罗斯福及其“新政”代表着第三次根本变革美国经济制度的希望,但鉴于经济持续萧条的现实,比尔德又对这种转变的前景表示怀疑。因为,“1933年以来,经济基础并没有出现重大变化”,“作为经济秩序象征的富人和天才的政党,并没有遭到严重削弱”。更让比尔德忧虑的是,罗斯福的政党有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放弃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全面介入世界大战。“如果美国的传统和实践能为我们展望未来提供指南的话,那就是:不断扩大的经济灾难将在一场对外战争中终结,而不是在国内经济重大调整中终结……罗斯福总统并没有做出任何暗示他有意缓和美国、英国和日本在荣誉与海权上的竞争……这并不是说罗斯福总统在他规避经济危机的努力中,会处心积虑地把国家拖入一场太平洋战争。但我们不能排除‘事件’或‘挑衅’的发生。毕竟事件或挑衅几乎每天都会发生,而任何政府都可以迅速地把它放大成‘战争的正当理由’。”^③在1936年出版的小册子《战争恶魔论》中,比尔德语气委婉却绵里藏针地写道:“我们不可能知道战争的最终原因,但我们能够知道那些引向战争边缘的领导人以及那些导向战争边缘的活动”。比尔德暗示:对于观察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动向,威尔逊总统的前车之鉴可以起到参照作用。^④

在随后几年的一系列著述中,^⑤比尔德反复阐释上述战争理论,对罗斯福总统的怀疑和敌意不断发展、升级,并最终在《1932年至1940年:制定中的美国外交政策》、《1941年: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两书中达到高潮。在前书中,比尔德不厌其烦地辩称,对1932至1940年间官方公开文件的考察表明,此时罗斯福总统尚未大幅度偏离中立立法,但从1941年起,美国已不再对发生于欧洲战争保持中立,到年底实际上已经成为交战国。比尔德暗示:罗斯福虽然在公开场合声言追求中立与和平,背地里却准备把美国带入到与轴心国的战争中去。后书则大量引用已公开的政治领导人的言论、国会辩论、听证会记录以及报刊报道,把罗斯福致力于中立与和平的“表象”(appearances)与其秘

① 约翰·海厄姆:《书写美国史》(John Higham,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Essays on Modern Scholarship*),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136页。

②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帕林顿》,第323页。

③ 查尔斯·A. 比尔德:《国家政治与战争》(Charles A. Beard, "National Politics and War"),《斯克里布纳杂志》(*Scribner's Magazine*)1935年第2期,第69—70页。

④ 查尔斯·A. 比尔德:《战争恶魔论》,第15、32、33、58页。

⑤ 主要是《头脑发昏与对外争吵》;《处于中途的美国》(*American in Midpassage*),麦克米兰公司1939年版;《我们正在稀里糊涂地走向战争》("We're Blundering into War"),《美国信使》(*The American Mercury*)1939年第184期,第388—390页。

密活动和言论的“真相”(realities)相对照,告诉读者的真相就是:罗斯福处心积虑地采取了一项旨在把美国拖入欧洲战争的政策;当一系列不符合中立法的动作没能达到刺激希特勒对美国宣战的目的后,罗斯福政府转而挑衅日本,使之袭击了珍珠港,从而为美国参战制造了借口。可以说,比尔德最先提出了珍珠港事件“阴谋论”。对此,他写道:“对交战国提供弹药,动用美国海军为交战国船只护航,向德国潜艇开火,这些在目的和事实上,都是战争行为。它们将会而且是有意地将美国带入到全面和公开的战争中。发生了这种情况,若能置身战争之外,此乃伪善。一方面更加狂热地采取这些敌对行为,另一方面却告诉美国人民他们能够置身战争之外,也不会送他们的孩子去国门之外打仗,此乃无耻的欺骗。声言从事这场热战的目的是纯粹保卫美国、御敌于国门之外,此乃对国人的愚弄。说什么根据《租借法案》采取的进攻性措施不是‘好战行为’,仅仅是为保卫美国,此乃彻头彻尾的欺诈。声言美国政府实际上不希望国家进入战争,也没有处心积虑地操纵国家进入战争,此乃虚情假意。”^①总之,比尔德相信:罗斯福利用总统权力“歪曲和秘密操纵外交政策、外交事务和战争政策”,开创了危及宪法代议制政治体制的不祥先例。^②

关于比尔德对罗斯福的政治欺骗和权力集中大加挞伐的原因,学术界提出了一种心理学解释。肯尼迪和斯图尔茨认为,罗斯福在内外政策上没能躬行实践比尔德的国家利益哲学,使曾为白宫座上宾的比尔德深感失望。结果,在理想破灭和受“怠慢”(misplace)屈辱心理推动下,比尔德把种种不快发泄到了总统身上。^③坎贝尔则在心理分析之外,从比尔德外交史学理论遭遇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他认为,“免费安全”(free security)概念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比尔德“大陆主义”和外交史经济解释的基础。然而,战争技术的进步、德意日黩武主义的兴起、二战的惨烈等现实,摧毁了“免费自由”概念的前提预设,进而摧毁了比尔德外交史学的一般方法和“大陆主义”理论。结果,20世纪40年代比尔德关于罗斯福外交政策的研究上,放弃了先前的美国采取干预政策是由经济因素推动的观点,转而对罗斯福在外交操作上的表里不一和违宪之举进行狭隘的和恶意的揭发控诉。^④可见,坎贝尔把比尔德对罗斯福的批评归因于比尔德理论破产后的无奈和恶意之举。这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心理学分析。

本文认为,比尔德对罗斯福的抨击,源于他对美国宪政民主制度遭到破坏的担忧,也是其晚年史学探索的结果。珍珠港事件后,比尔德停止了反战政治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对未来岁月“能用来指导我们的政府和经济活动(之原则)”的学术探索中。他先后出版了3部专著——《美国精神》(1942年)、《共和对话录》(1943年)和《美国简史》(1944年),^⑤系统而深入地阐发了如下主题:第一,对美国宪政体制的由衷钦佩,颂扬其优点在于多数人统治与“基本权利”之间的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第二,津津乐道于美国人的“文明观念”和美国文明的独特性,认为美国人的文明观念包括“尊重生命、人类价值、与社会原则相容的最大化自由、劳工的尊严和才用、普遍参与社会工作

① 查尔斯·A. 比尔德:《1941年: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第173页。

② 查尔斯·A. 比尔德:《1941年:罗斯福总统与战争的来临》,第598页。

③ 杰拉尔德·斯图尔茨:《查尔斯·比尔德论美国外交政策》,第139、143页;托马斯·肯尼迪:《查尔斯·比尔德与美国外交政策》,第74页。

④ 坎贝尔·克莱格:《查尔斯·比尔德并不令人诧异的职业》。

⑤ 查尔斯·A. 比尔德:《美国精神:美国的文明观念研究》(Charles A. Beard, *The American Spirit: A Study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麦克米兰公司1942年版;《美国简史》(*A Bas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新家园图书公司1944年版。

并从中获益的规则”。这种观念赋予美国文明以独特性,美国文明不能与“不具备这种精神和活力的异类文明相融合”,从而保持美国文明的纯洁性并对世界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第三,指出当下美国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同时传递对未来充满的希望,坚信人类塑造事态的意志和行动,呼吁国人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①

总之,战争期间比尔德学术思考的重心是美国文明和宪政体制的前途命运。在他的观察和思索中,随战争而来的总统外交和行政权力的快速集中和过度膨胀,无疑是最大危险之一。比尔德对罗斯福的批评,旨在质疑罗斯福总统对宪法的尊重以及他对美国人民的诚实,而不在于讨论美国参战的功绩或美德。对此洞若观火的布兰迪斯写道:“对比尔德而言,所有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民主控制(democratic control)的根本性问题。”^②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把比尔德归入美国外交思想中的“杰斐逊主义学派”,其根据之一,就是比尔德捍卫国内民主自由的信仰和强调对外交政策宪政的规范。^③实际上,关注对外干涉、介入战争对国内民主、自由的危害,对总统外交权力进行严格宪法解释和控制,是比尔德开创的美国外交史学进步主义范式的重要思想和学术特征之一。

四、进步主义传统的开创者

比尔德从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外交史学的草创期。当时,以塞缪尔·比米斯(Samuel Flag Bemis)、德克斯特·珀金斯(Dexter Perkins)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派(nationalist)占据着美国外交史学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外交史写作,强调把美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颂扬推动美国国力增长的外交成就和保持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基本原则,如公海自由、避免卷入欧洲政治、大陆扩张、门罗主义等。他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旨在促进国际关系中的和谐与自由。比米斯称之为“自由的福音”;珀金斯视之为“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的热爱和平之精神”。所以,有的学者将比米斯、珀金斯等人归入“理想主义学派”。^④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比尔德最早对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其开拓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老资格的外交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t)在评论《国家利益观念》一书时,称它“将会给美国外交史研究引入一种所需要的现实主义的解释”,预言“未来任何就这一课题(国家利益)进行全面或局部研究的人,都不能忽略比尔德的相关论述”。^⑤丹涅特的预言是准确的。现实主义学派理论奠基人汉斯·摩根索在1951年出版的《捍卫国家利益》一书中,对比尔德关于建国之父国家利益观的分析表示赞同。^⑥布兰迪斯1992

① 约翰·布雷曼:《查尔斯·比尔德》(John Braeman, “Charles A. Beard”), 克莱德·N. 威尔逊主编:《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Clyde N. Wilson ed.,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ans*), 盖尔研究公司1983年版,第54页。

② H. W. 布兰迪斯:《美国欠世界什么》,第142页。

③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著,曹华银译:《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93、223页。

④ 多萝西·胡戈斯特雷特:《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外交政策:一项综合研究》(Dorothy Jane Van Hoogstrat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Realists and Idealists: A Catholic Interpretation*), 赫德尔公司1960年版,第91、211页。转引自王晓德:《美国外交的奠基时代(1776—1860)》,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20页。

⑤ 泰勒·丹涅特:《评国家利益观念》(Tyler Dennett, “Review on The Idea of National Interest”), 《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34年第1期,第744页。

⑥ 汉斯·摩根索:《捍卫国家利益》(Hans Morgenthau, *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阿尔弗雷德·诺普夫公司1952年版,第241—242页;王希:《美国历史上的“国家利益”问题》,《美国研究》2003年第2期,第11—12页。

年发表了题为《国家利益观念》的文章,他也谦卑而不失真诚地表示:该文标题是他“盗自”比尔德的。^①比米斯称赞《国内的门户开放》一书“将成为美国政治思想方面的经典之作,虽然不如《联邦党人论集》简洁,但在影响力上可望与之比肩”。^②这些都是对比尔德学术思想非常高的评价。

应该注意的是,比尔德的“现实主义”与现实主义学派存在着很大区别。第一,在国家利益概念上,比尔德的国家利益观归根结底属于经济学范畴,他关心的是外交政策如何影响国内的普遍繁荣和社会福利,而不是外交政策对国家权力的影响。所以,布兰迪斯称比尔德持“一种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利益观”。^③现实主义的國家利益观是国际政治学理论,与国家权力联系在一起。摩根索指出,现实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把利益确认为权力”;国家利益最重要的是国家的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统一。^④第二,在权力概念上,现实主义主义的权力概念尽管难以界定,但其基本含义指一个行为体根据其意愿来影响另一个行为体去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是某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所拥有的经济、军事、科教、文化、制度等各种实力的总和。^⑤比尔德也关注权力问题,但他的权力属于国内政治范畴,对于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意义不大。所以,丹涅特就提出这样的反问:“在一个由相互竞争的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里,国家利益的界定怎么能够不考虑国家权力的层面呢?”^⑥因此,比尔德对美国外交史学的贡献并非体现在其现实主义上,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即进步主义传统范式的开创上。

关于比尔德之进步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地位,美国外交史学界有着比较统一的认知。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21世纪初,查尔斯·内乌(Charles E. Neu)、亚历山大·德康德(Alexander DeConde)、韩德(Michael Hunt)、弗兰克·宁科维奇(Frank Ninkovich)等学者,对此都有比较明确的论述。^⑦中国学者王立新准确清晰地总结了进步主义范式的学术特征,并同样把进步主义范式的缘起追溯到比尔德那里。^⑧

① H. W. 布兰迪斯:《国家利益观念》(H. W. Brands, “The Idea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外交史》1999年第2期;《观念与外交》(“Ideas and Foreign Affairs”),罗伯特·D. 舒辛格主编:《美国对外关系史研究指南》(Robert D. Schulzinger ed., *A Companion to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4页。

② 塞缪尔·比米斯:《比尔德的〈国内的门户开放〉》(Samuel Flagg Bemis, “Beard: The Open Door at Home”),《美国历史评论》1935年第3期,第543页。

③ H. W. 布兰迪斯:《国家利益观念》,第245页。

④ 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5页。

⑤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0页。

⑥ 泰勒·丹涅特:《评国家利益观念》,第744页。

⑦ 查尔斯·E. 内乌:《变动中的美国外交政策解释结构》(Charles E. Neu, “The Changing Interpretive Structure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约翰·布雷曼等编:《20世纪美国外交政策》(John Braeman, et. al., eds.,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6页;亚历山大·德康德:《转型中的美国外交史学》(Alexander DeConde,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in Transformation*),美国历史学会出版物1976年版,第11—13页;迈克尔·H. 亨特:《美国外交史学的长危机》(Michael H. Hunt, “The Long Crisis in U. S. Diplomatic History”),《外交史》1992年第1期;弗兰克·宁科维奇著,牛可译:《范式失落:文化转向和美国外交史的全球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⑧ 王立新总结的进步主义范式的特征是:从国内环境寻找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力量,相信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动因植根于美国社会之中,探究美国国内各种社会力量对政策的影响;试图回答这样一些核心的问题:美国外交政策与美国社会的关系是什么?美国国内的经济制度、阶级结构、利益集团(特别是美国经济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是如何塑造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美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对美国社会有什么影响?参见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第29页。

问题是,美国外交史学草创之初,在进步主义范式内从事外交史研究的,除比尔德之外,尚有弗雷德里克·特纳^①、朱利叶斯·普拉特^②、托马斯·贝莱^③等大家名家,为何专奉比尔德为“正朔”?答案在于,相较于其他进步主义史学家,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学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是在知识论层面,其史学的宏观理论性;二是在意识形态层面,其思想的激进性。

比尔德史学的宏观理论性表现为,他致力于历史“普遍性理论”的探寻,关注大问题,不拘小节。威廉·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认为,这是比尔德高出其同代学者的地方。在他看来,比尔德的同代人“愿意就具体和个别进行深入写作,比尔德志在就普遍性展开意义非凡的论说”。^④ 根据美国学者兰道尔·科林斯(Randall Collins)的“智识变迁”理论,一种学说或理论若要开创新范式,需具备两个看似矛盾的特征:“伟大的学说”和“伟大的不完美性”。学说要伟大,才能被广泛引用,并衍生出其他的分支学说;学说要不完美,才能成为论敌攻击的目标,从而给本学派带来隐含的社会力量。^⑤ 应该说,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史是具备上述两大特征的,这是其影响力的源泉。相较之下,特纳、普拉特、贝莱的研究精细深入,论题却略显狭窄,不足以引发连绵不绝的争论和思考。

从意识形态层面看,比尔德思想之激进,批判史观之彻底,均非特纳、普拉特、贝莱等人所能比拟。彼得·诺维克(Peter Novick)指出,美国历史解释中的各个学派在政治上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受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的指导。他把意识形态划分为三类——“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服从者的意识形态”和“对立者的意识形态”,并将进步主义者归为服从者的意识形态。^⑥ 他比较了进步主义史学四个代表人物(特纳、罗宾逊、贝克尔、比尔德)的意识形态后发现,比尔德“最为活跃,思想也最极端”;“特纳坚守在进步主义比较保守的边缘上,而比尔德则处在大致可以归类于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运动中”。^⑦ 换句话说,比尔德是服从者意识形态中的“激进派”和“改革派”,他对美国外交持批判立场,主张在现存宪政体制框架内,改革国内社会体制和外交体制。况且,特纳在美国外交史学草创期既已离世(1932年),普拉特和贝莱在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也倒向了保守主义,^⑧ 比尔德成为“硕果仅存”的进步主义史学大家。

比尔德的美国外交史研究及其外交政策主张,在战后年代影响了一批修正主义者。比如查尔斯·坦西尔(Charles C. Tansill)的《战争后门》(1952年)、哈利·巴恩斯等编著的《为了永久和平的

- ① 特纳是研究联邦党人时代外交的专家,关注塑造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压力,他的几个弟子也是名震一时的外交史专家。在内向路径的开辟上,应该说特纳是早于比尔德的。参见亚历山大·德康德:《转型中的美国外交史学》,第6页。
- ② 普拉特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1812年的扩张主义者》(Julius W. Pratt, *Expansionists of 1812*, 麦克米兰公司1925年版),分析了商业、宗教等特殊利益集团的扩张观念与1812年战争之间的关系,开辟了思想史或观念史的研究领域,同样是内向分析路径的成功范例。
- ③ 贝莱关注公众舆论对危机决策的影响,同样走内向分析的路径。参见托马斯·A. 贝莱:《西奥多·罗斯福与日美危机》(Thomas A. Bailey,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Japanese-American Crisi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34版;《美国人民的外交史》(*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英格伍德·克里夫斯公司1940年版。
- ④ 威廉·威廉斯:《论查尔斯·比尔德对普遍性因果论的探寻》(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A Note on Charles Austin Beard's Search for a General Theory of Causation”),《美国历史评论》1956年第1期,第80页。
- ⑤ 兰道尔·科林斯:《哲学社会学:全球性智识变迁理论》(Randall Collins, *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 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3页。
- ⑥ 彼得·诺维克著,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83、625页。
- ⑦ 彼得·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第129—130页。
- ⑧ 查尔斯·内乌:《变动中的美国外交政策解释结构》,第28页。

永久战争》(1953年),^①都深受比尔德对罗斯福外交批判的启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反罗斯福的修正派”。

不过,真正把比尔德外交史学发扬光大的是威廉斯及其学派。威廉斯对比尔德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看法。他认为,比尔德对外交政策分析强调了三方面:(1)外交政策与国内事务密切相关;(2)美利坚帝国的建立并非“无心插柳”之作;(3)扩张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常常使问题复杂化和深化。^②威廉斯在上述三个方面竭力效仿比尔德,在继承和发展比尔德外交史学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门户开放学说”,并言传身教,创立了“威斯康星学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了广泛而巨大的影响。^③威廉斯常常以“当代比尔德”自况。有的人认为,他在某些方面,如褒扬胡佛贬抑罗斯福方面,“较比尔德本人更比尔德主义”。^④

威廉斯之后进步主义传统的代表,当推威廉斯的高足沃尔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拉夫伯的《新帝国》^⑤一书从经济、思想、战略等方面,分析了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扩张的国内根源,拓宽和深化了内向分析路径。他的《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⑥一书,研究了美国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带来的种种灾难,尤其是这种政策在国外造成的混乱和革命,延续并深化了反对帝国主义外交路线的进步主义主题。《宪法与美国外交政策》、《美国世纪里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⑦等文章表明,拉夫伯与其进步主义传统先辈一样,始终关注着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此外,威廉斯的另一位高足托马斯·麦考密克(Thomas J. McCormick)及深受其学说影响的迈克尔·霍根(Michael Hogan)等人提出了“合作主义模式”(Corporatism 或 Corporatist Synthesis),认为美国外交政策是美国工业、商业、金融业、农业、劳工以及其他利益团体同政府密切配合、为共同扩大美国在海外的影响和促进美国的利益而妥协与合作的产物。合作主义模式延续了内向分析的路径,并试图把这一路径由先前比尔德的经济利益、威廉斯的意识形态、拉夫伯的经济制度,延伸

① 查尔斯·C. 坦西尔:《战争后门:罗斯福的外交政策(1933—1941)》(Charles C. Tansill, *Back Door to War: The Roosevelt Foreign Policy, 1933 - 1941*),亨利·莱格尼里出版社1952年版;哈里·巴恩斯编:《为了永久和平的永久战争》(Harry Elmer Barnes ed.,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卡克斯顿出版社1953年版。

② 威廉·威廉斯:《查尔斯·比尔德:激进保守主义知识人》(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Charles Austin Beard: The Intellectual as Tory-Radical”),亨利·W. 柏格主编:《威廉·威廉斯选集》(Henry W. Berger ed., *A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Reader*),伊凡·迪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107、113页。

③ 关于威廉斯的“门户开放学说”,参见曲升《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第四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④ 保罗·M. 布勒、爱德华·赖斯—马克西敏:《威廉·威廉斯:帝国悲剧》(Paul M. Buhle and Edward Rice-Maximin,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Empire*),劳特利奇出版社1995年版,第134页。

⑤ 沃尔特·拉夫伯:《新帝国》(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 1860 - 1898*),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⑥ 沃尔特·拉夫伯:《美国人对机会的寻求,1865—1913年》(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Opportunity, 1865 - 1913*),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 沃尔特·拉夫伯:《宪法与美国外交政策》(Walter LaFeber, “The Constitution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 Interpretation”),《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1987年第3期;《美国世纪里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张力》(“The Tension between Democracy and Capitalism during the American Century”),《外交史》1999年第2期。

至社会层面。^① 进步主义传统就这样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至今在美国外交史学中占据着一席之地,发挥着广泛影响。

结 语

比尔德既是一个运用历史技艺的政治思想家,又是一个运用政治洞见的历史学家。^② 总体上看,作为一位进步主义史学家,比尔德深信学术研究为现实服务的必要性和历史相对主义。因此,他常将历史研究与其政策主张混在一起。这种研究取向和风格导致他的著作带有很强的政论和策论色彩,甚至有些难以称得上严格意义的学术著作。

比尔德的进步主义外交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美国“例外论”。不过,他的“例外论”不是传经布道式的,而是孤立主义的,这决定了他一些历史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时代局限性。在国家安全层面,比尔德还停留在18、19世纪华盛顿、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的依靠两洋(大西洋、太平洋)天险,享受“免费安全”的地缘政治观的认识水平上,既未认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战争技术的进步早已打破了美国的免费安全状态,也未考虑到德意日法西斯的兴起对美国国家利益乃至整个人类利益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③ 大量研究并不支持他提出的罗斯福抱着邪恶意图,采用阴谋诡计,诱使日本袭击珍珠港的“阴谋论”。^④ 此外,他的“大陆主义”、“国内门户开放”等反对国际主义的主张,是与全球化

- ① 从理论层面对“合作主义”加以论证的是托马斯·J. 麦考密克和迈克尔·霍根,参见托马斯·J. 麦考密克《随波逐流还是掌控局势? 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合作主义综合》(Thomas J. McCormick, “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美国历史书评》(*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1982年第4期;迈克尔·J. 霍根《合作主义:一种正面评价》(Michael J. Hogan, “Corporatism: A Positive Appraisal”),《外交史》1986年第4期。运用“合作主义”模式对美国外交史进行研究的主要论著有:迈克尔·J. 霍根:《非正式协议:英美经济外交中的私人合作结构》(Michael J. Hogan, *Informal Entente: The Private Structure of Cooperation in Anglo-American Economic Diplomacy*),密苏里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马歇尔计划:美国、英国与西欧的重建(1947—1952)》(*The Marshall Plan: America, Britai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Western Europe, 1947 - 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艾莉丝·W. 霍利:《“合作自由主义”的发现和研》(Ellis W. Hawley, “The Discovery and Study of a ‘Corporate Liberalism’”),《商业史评论》(*Business History Review*)1978年第3期;艾莉丝·W. 霍利:《赫伯特·胡佛、商务部与“合作国家”的设想》(Ellis W. Hawley, “Herbert Hoover, the Commerce Secretariat, and the Vision of an ‘Associative State’”),《美国历史杂志》1974年第1期;艾莉丝·W. 霍利:《大战与对现代秩序的寻求:美国人民及其制度的历史(1917—1933)》(Ellis W. Hawley, *The Great War and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Ord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Institutions, 1917 - 1933*),圣马丁出版社1979年版;琼·霍夫—威尔逊:《赫伯特·胡佛:被遗忘的进步主义者》(Joan Hoff-Wilson, *Herbert Hoover: Forgotten Progressive*),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75年版;琼·霍夫—威尔逊:《美国商业与外交政策(1920—1933)》(Joan Hoff-Wilson, *American Business and Foreign Policy, 1920 - 1933*),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托马斯·弗格森:《从回复常态到新政:工业结构、政党竞争与大危机期间的美国公共政策》(Thomas Ferguson, “From Normalcy to New Deal: Industrial Structure, Party Competition, and American Public Poli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84年第1期。
- ② 马克斯·勒纳:《查尔斯·比尔德的政治理论》(Max Lerner, “Charles Beard’s Political Theory”),霍华德·比尔主编:《评查尔斯·比尔德》,第25页。
- ③ 坎贝尔·克莱格:《查尔斯·比尔德并不令人诧异的职业》,第253页。
- ④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约瑟夫·C. 格鲁:《出使日本十年》(Joseph C. Grew, *Ten Years in Japan*),纽约1944年版;谢尔曼·马勒斯:《回顾珍珠港》(Sherman Miles, “Pearl Harbor in Retrospect”),《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1948年7月,第65—72页;罗伯特·H. 费雷尔:《珍珠港与修正学派》(Robert H. Ferrell, “Pearl Harbor and the Revisionists”),《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1955年第2期,第215—253页;鲁伊兹·莫顿:《正确认识珍珠港事件:一项基于相关文献的考察》(Louis Morton, “Pearl Harbor in Perspective: A Bibliographic Survey”),《美国海军学会会刊》(*U. S. Naval Institute Proceedings*)1955年第4期,第461—468页;塞缪尔·E. 莫里斯:《战略与妥协》(Samuel E. Morison, *Strategy and Compromise*),里特尔和布朗公司1958年版;哈里·H. 兰森:《中央情报与国家安全》(Harry H. Ransom, *Central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罗伯特·沃思戴德:《珍珠港:警告与决策》(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

的客观进程和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根据入江昭的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美国稳步走向全球化、全面卷入世界安全、经济和文化事务之中的时代。^①在这样一个全球性联系日益密切的大背景下,让获得了世界优势的美国回到孤立主义的老路上,不仅不可能,亦非其所愿。20世纪20年代的历届共和党政府走的都是国际主义路线,决意要让美国在世界上发挥指导作用。罗斯福虽然受制于蔓延全国的孤立主义情绪,但他作为坚定的威尔逊主义者最终引领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把威尔逊主义的理想抱负付诸实践。^②而且,在当时全国性的外交大辩论中,孤立主义失败,国际主义胜出并在战后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③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不过,比尔德的外交史学及其外交政策主张对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并非毫无意义。霍夫斯塔特指出,比尔德的外交史著作充满着“对那早已使得美国外交政策深受其害的全球‘救世主义’的中肯警告和反对”。其现实主义的本质,在于他深刻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美国人尽管心存善意,“却并没有照料、教化或民主化世界其他地区的责任、能力和必要。他试图告知美国人过度扩张隐含的危险”。^④此外,他的外交史学和外交政策思考关注国内改革和民众福祉,关注宪政民主和自由权利,期盼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具有纯粹学术研究之外的广泛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比尔德留给进步主义外交史学最重要的学术和思想遗产。

[本文作者曲升,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杜娟)

① 入江昭:《美国的全球化进程(1913—1945)》(Akira Iriye, *The Globalizing of America, 1913 - 1945*),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② 韩德著,马荣久等译:《美利坚独步天下:美国是如何获得和动用它的世界优势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9—132页。
③ 王立新:《珍珠港前的美国外交大辩论及其意义》,《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④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进步主义历史学家:特纳、比尔德、帕林顿》,第324页。